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K295:1
X68a9

TONGSHI DANGDAI ZHENGZHI

上海通史

熊月之/主编

第11卷

当代政治

陈祖恩 叶 斌 李天纲 著

A0909482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接管上海与巩固政权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结束，天下大势，显而易见。2月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负责解放江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

> 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1]

得天下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点考虑如何治天下了。治天下的关键在于管理大城市，而共产党的大部分干部对于管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十分陌生的。因此进城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共产党干部要从头学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对于这中国第一大都市的接收和管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共产党发挥其善于统战、善于发动群众的特长，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界人士，照顾多方利益，克服财政金融危机、美蒋封锁轰炸等种种困难，在一年内顺利完成了接管上海工作，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城市管理机构和工作方式。

China

一 接管旧上海,建立新政权

旧上海有旧制度、旧人员、旧生活方式,新政权有新政策、新气象、新工作方式,接管上海是新旧交替的第一步。接管干部和入城部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城市政策,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顺利完成了接管任务。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丹阳集训与入城政策

丹阳是镇江附近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小城,负责接管上海的饶漱石[2]、陈毅[3]等于1949年5月初进驻此地。各路准备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约有5000多人先后于当月在此会师[4],集中学习接管上海的政策和纪律。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批接管干部的调配和培训。1948年12月,中央致电上海局选派30—50名干部,前往东北解放区学习城市管理经验,作为今后接管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干部。与此同时,华东局迅速抽调大量干部,特别是具有南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到青州华东局党校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和已有的接管经验。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并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华东、华中调动及训练1.5万名干部,于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随军南下。要求华北调集1.7万名干部,2月底前应将其中8000人集中于石家庄,交华东局率领,随军南下。要求东北局准备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去接收上海。当时时间紧迫,南下干部们一边南下一边集中一边学习,一路上不断有从各地赶来的干

部加入，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5]。3月14日，中共中央内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后邓小平往西南主持工作，遂以饶漱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5月上旬，潘汉年、夏衍、许涤新[6]奉命从香港回到北平，准备参加上海的接管。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面授机宜。5月16日，潘汉年等南下丹阳。此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7]、刘少文等也已到达丹阳。

在丹阳，接管干部们学习了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毛泽东、朱德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聆听了饶漱石、陈毅关于接管工作的报告，明确了接管上海的政策和纪律。

毛泽东有句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全国即将解放之际，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8]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接管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应吸收这类代表人物参加工作。5月20日，中共中央就接管上海的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复饶漱石、华东局电，要求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和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接管[9]。总之，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这是首要的入城政策。

其他重要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保护全体人民和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民族工商业，力求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没收官僚资本；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

各级政权的大小官员以及警察等,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除停征少数捐税外,旧有各种税收,照旧征收;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制制度;采用"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接管方针等。

陈毅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要走弯路"。为此,除了原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外,参照中央制订的城市纪律,华东军区又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纪律,其中包括:战斗结束后,除用于维持秩序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一切机关部队人员,凡未持有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所发之证件、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机关部队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除外国侨民事务管理处外,任何机关和干部不许和外国人谈话或发生直接关系,严禁擅入外国侨民的机关及私人住宅;遵守市内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共卫生;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得私受馈赠、私取公物等。[10]

华东局社会部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配合下,编成了《上海概况》及其他调查资料30册,约百余万字,详细介绍了上海各方面的情况。这套材料在丹阳集训时发给了各系统接管专员,为接管干部了解上海、制订接管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时,由粟裕[11]负责的攻占上海的军事准备早已就绪,入城前的物资筹备和调运也已安排妥当。在上海市内,中共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群众,进行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斗争,迎接解放。

解放军纪律严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了上海。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然后,以15万人担任市区警备,6万人担任吴淞、江湾、高桥、川沙、南汇、奉贤等郊区的警备。21万人、5000多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岗哨，声势浩大，日夜巡逻，给上海人民以安全感，给敌对势力以巨大震慑。

纪律严明、为民服务，是解放军给上海人的第一印象。部队初进上海，遵照陈毅司令员关于“没有找到营房以前，部队一律睡马路”的指示，不入民宅而露宿街头。战士们用快板抒发此时的感受：“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破麻袋，又是铺，又是盖，晚上睡觉怪凉快。”在一次火灾中，某部七连以一人牺牲、数人负伤的代价，从火海中救出了70多位居民，被救者感激涕零。战士们对缴获的金银财宝，眼不红，心不动，如数上缴；对自己看管的各类物资，嘴不馋，手不摸，尽责守护。6月初，部队将缴获的被国民党强行征用的数千辆民用汽车发还原主。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上海人从中看到了一支新型军队。一位教授目睹了解放军的风貌，沉思良久，最后断定：“国民党回不来了。”美国《生活》杂志根据大量的有关解放军遵纪爱民的新闻报道，发表评论说：“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12]

王国瑞事件不仅可以说明军纪之严，从中还可看出当时的军民关系。6月3日下午，警备部队某部一辆大卡车自郊外送饭入城，在天平路广元路口，将骑自行车路过的同济大学学生熊恭礼撞成重伤，在医院不治身亡。该部首长亲赴死者家属处赔罪道歉，拨款治丧，并致信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深表歉意。入殡之日，又派代表送花圈致哀。淞沪警备司令部特通令全市警备部队，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肇祸司机王国瑞，被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处死刑[13]。消息传到同济大学，学生们大为感动，全体学生连开3次紧急会议，决定以学生自治会名义致函警备司令部，函曰：

> 来示已悉，值此解放伊始，建设需才之际，熊君之死固为惋惜，但贵军对此事极端重视，竟因此通报全军进行教育，故其死亦富有重大意义，事后贵军派代表亲往死者亲属家中致殷切慰



图 1-1 进入市区的解放军严格遵守入城纪律，露宿在上海街头

问之意，并予以合理解决，其处理之善，存殁咸服，人民解放军一贯之良好军纪，实为蒋管时所罕见，此更使我全体同学赞佩不已。至于肇祸之驾驶兵，依军纪固应受相当处分，但熊君之死非其一人之过错，故敝会谨代表全体同学恳祈贵军对肇事者之惩罚务请减轻为幸。[14]

此事见报后，工、学、商、法各界也纷纷投信市府、警备司令部及《解放日报》，恳切吁请为王国瑞减刑。警备司令部为此向华东军区陈毅司令、饶漱石政委和粟裕副司令请示。华东军区司令部为尊重民意，批准免处死刑，改判有期徒刑。6 月 15 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判处王国瑞有期徒刑三年，并发表公开信答谢各界人民的隆情厚意。[15]

在攻占上海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解放军扫雷 2 万余枚，收容遣散非法武装数千人，收容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 15427 人，成功地维持了社会秩序。随着上海日趋安定，8 月 1 日，警备部队换防，人数减

China

为7万余，固定岗哨减到1300多处，依旧保持着足够的威慑力量。[16]

按照系统，整套接收

上海解放当天，上海市军管会即宣告成立，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下辖政务、财经、文教、军事等四个接管委员会，立即投入接管工作。

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林，副主任曹漫之）接管了下列单位：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所属财政、卫生、工务、公用、教育、地政、民政、警察、社会等9个局，统计、调查、人事、秘书、会计、新闻、外事、总务、交际等10个处，20个市区公所，10个郊区公所；原法院、检察院、监狱等司法机关11个；原国民党中央财政部所属直接税局、货物税局等。除原调查处、统计处第三科人员大部逃跑外，上述其他单位的员工绝大部分留在原岗位上听候接管，共接管旧员45280人。[17]

政务系统的接管对象在性质上都属于旧的国家机器，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需要拆散、打乱。但接管干部的人数、经验都不足以应付大上海繁杂的管理事务，因此，对不同类型的机构



图1-2　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块木牌，由陈毅市长请擅长书法的秘书武中奇书写。当年这块木牌挂在江西中路二百五十一号市政府大门口

China



图 1-3 上海市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证章、胸符。

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原社会局、调查处、统计处予以撤销。原法院、检察院、监狱在组织形式上进行彻底改造，成立人民法院，撤销检察机构(1951 年重新设立)，废弃民国“六法全书”，根据人民政府施政纲领、政策、决议、法令等进行审判和调解。对于其他主要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旧机构，在接管初期不作巨大变动，基本执行原来的机构职能，由接管干部担任主要负责人。

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18]，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执行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政策，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沪的银行、工厂以及财贸、商业、交通、邮电企业共 411 个单位，其中工厂 157 家，掌握全市 41%左右的纱锭，三分之一的机器制造设备，五分之一的钢铁冶炼设备。接管的物资有黄金 24600 两，白银 36 万元，金圆券 21 万亿元，台币 2.4 亿元，台糖 3.5 万吨，粮食 47 万石，新旧好坏不等的汽车 1.8 万辆，汽油 4887 万加仑。在上述单位服务的旧职员工 15.3 万名。[19]

这些企业是“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的，不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有机构。旧员工如愿意继续服务，则保持原职原薪。接管干部先对企业实行监督生产，以后根据条件再进行改革。

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唐守愚、戴白韬)共接收原国立大专院校 19 个，公立中小学和其他教育机关 521 个，以及由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等行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业的65个单位。

文教接管的任务是迅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剥夺反动派的言论出版自由。高等教育方面，暂时不撤换人员，只改用校务委员会来负责校务，停止国民党的训育制度，停止党义和公民课程，易以马列主义教育的政治课。教会学校取消宗教必修课。中小学方面，校长大部分予以更换，并换用老解放区编的教科书。新闻出版方面，上海解放当天，军管会就颁布了《报纸杂志通讯社暂行登记条例》，各新闻单位需经登记并经审查批准后，方能工作。结果，上海有14家报纸、3家通讯社（新华社华东总分社、新华社上海分社、工商新闻社）和89家杂志（实际出版77种）取得合法地位。这些报纸都是进步的，杂志则至少是中性的。[20]

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粟裕，副主任唐亮）接收了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在上海的营房、医院、机场、军工厂、仓库等处。

接管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平稳，除了军事系统外，其他系统的房屋、器械、设备、档案都保存得相当完好。这是入城政策的成功，也反映了人民对新政权的支持。

人民政府的工作方式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为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21]为副市长。下午3时，陈毅带着潘汉年、宋时轮等人来到上海市府大楼，在市长办公室内，陈毅坐在市长的座位上，潘汉年等坐在旁边。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22]在接管干部的陪同下走了进来，陈毅微笑着同他握手，谦和地招呼他坐在市长办公桌的对面，宣布举行接管上海市政府的仪式。赵祖康将旧上海市政府印信上交陈毅市长，陈毅接过印信并简短致词："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府关防印信，保存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K295:1
X68a9

TONGSHI DANGDAI ZHENGZHI

上海通史

熊月之/主编

第11卷

当代政治

陈祖恩 叶 斌 李天纲 著

A0909482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China

第一章　接管上海与巩固政权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结束，天下大势，显而易见。2月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负责解放江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

> 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1]

得天下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点考虑如何治天下了。治天下的关键在于管理大城市，而共产党的大部分干部对于管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十分陌生的。因此进城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共产党干部要从头学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对于这中国第一大都市的接收和管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共产党发挥其善于统战、善于发动群众的特长，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界人士，照顾多方利益，克服财政金融危机、美蒋封锁轰炸等种种困难，在一年内顺利完成了接管上海工作，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城市管理机构和工作方式。

China

一 接管旧上海,建立新政权

旧上海有旧制度、旧人员、旧生活方式,新政权有新政策、新气象、新工作方式,接管上海是新旧交替的第一步。接管干部和入城部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城市政策,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顺利完成了接管任务。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丹阳集训与入城政策

丹阳是镇江附近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小城,负责接管上海的饶漱石[2]、陈毅[3]等于1949年5月初进驻此地。各路准备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约有5000多人先后于当月在此会师[4],集中学习接管上海的政策和纪律。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批接管干部的调配和培训。1948年12月,中央致电上海局选派30—50名干部,前往东北解放区学习城市管理经验,作为今后接管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干部。与此同时,华东局迅速抽调大量干部,特别是具有南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到青州华东局党校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和已有的接管经验。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并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华东、华中调动及训练1.5万名干部,于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随军南下。要求华北调集1.7万名干部,2月底前应将其中8000人集中于石家庄,交华东局率领,随军南下。要求东北局准备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去接收上海。当时时间紧迫,南下干部们一边南下一边集中一边学习,一路上不断有从各地赶来的干

部加入，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5]。3月14日，中共中央内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后邓小平往西南主持工作，遂以饶漱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5月上旬，潘汉年、夏衍、许涤新[6]奉命从香港回到北平，准备参加上海的接管。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面授机宜。5月16日，潘汉年等南下丹阳。此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7]、刘少文等也已到达丹阳。

在丹阳，接管干部们学习了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毛泽东、朱德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聆听了饶漱石、陈毅关于接管工作的报告，明确了接管上海的政策和纪律。

毛泽东有句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全国即将解放之际，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8]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接管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应吸收这类代表人物参加工作。5月20日，中共中央就接管上海的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复饶漱石、华东局电，要求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和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接管[9]。总之，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这是首要的入城政策。

其他重要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保护全体人民和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民族工商业，力求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没收官僚资本；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

各级政权的大小官员以及警察等,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除停征少数捐税外,旧有各种税收,照旧征收;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制制度;采用"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接管方针等。

陈毅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要走弯路"。为此,除了原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外,参照中央制订的城市纪律,华东军区又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纪律,其中包括:战斗结束后,除用于维持秩序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一切机关部队人员,凡未持有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所发之证件、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机关部队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除外国侨民事务管理处外,任何机关和干部不许和外国人谈话或发生直接关系,严禁擅入外国侨民的机关及私人住宅;遵守市内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共卫生;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得私受馈赠、私取公物等。[10]

华东局社会部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配合下,编成了《上海概况》及其他调查资料30册,约百余万字,详细介绍了上海各方面的情况。这套材料在丹阳集训时发给了各系统接管专员,为接管干部了解上海、制订接管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时,由粟裕[11]负责的攻占上海的军事准备早已就绪,入城前的物资筹备和调运也已安排妥当。在上海市内,中共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群众,进行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斗争,迎接解放。

解放军纪律严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了上海。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然后,以15万人担任市区警备,6万人担任吴淞、江湾、高桥、川沙、南汇、奉贤等郊区的警备。21万人、5000多处

岗哨，声势浩大，日夜巡逻，给上海人民以安全感，给敌对势力以巨大震慑。

纪律严明、为民服务，是解放军给上海人的第一印象。部队初进上海，遵照陈毅司令员关于“没有找到营房以前，部队一律睡马路”的指示，不入民宅而露宿街头。战士们用快板抒发此时的感受：“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破麻袋，又是铺，又是盖，晚上睡觉怪凉快。”在一次火灾中，某部七连以一人牺牲、数人负伤的代价，从火海中救出了70多位居民，被救者感激涕零。战士们对缴获的金银财宝，眼不红，心不动，如数上缴；对自己看管的各类物资，嘴不馋，手不摸，尽责守护。6月初，部队将缴获的被国民党强行征用的数千辆民用汽车发还原主。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上海人从中看到了一支新型军队。一位教授目睹了解放军的风貌，沉思良久，最后断定：“国民党回不来了。”美国《生活》杂志根据大量的有关解放军遵纪爱民的新闻报道，发表评论说：“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12]

王国瑞事件不仅可以说明军纪之严，从中还可看出当时的军民关系。6月3日下午，警备部队某部一辆大卡车自郊外送饭入城，在天平路广元路口，将骑自行车路过的同济大学学生熊恭礼撞成重伤，在医院不治身亡。该部首长亲赴死者家属处赔罪道歉，拨款治丧，并致信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深表歉意。入殡之日，又派代表送花圈致哀。淞沪警备司令部特通令全市警备部队，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肇祸司机王国瑞，被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处死刑[13]。消息传到同济大学，学生们大为感动，全体学生连开3次紧急会议，决定以学生自治会名义致函警备司令部，函曰：

> 来示已悉，值此解放伊始，建设需才之际，熊君之死固为惋惜，但贵军对此事极端重视，竟因此通报全军进行教育，故其死亦富有重大意义，事后贵军派代表亲往死者亲属家中致殷切慰



图 1-1 进入市区的解放军严格遵守入城纪律，露宿在上海街头

问之意，并予以合理解决，其处理之善，存殁咸服，人民解放军一贯之良好军纪，实为蒋管时所罕见，此更使我全体同学赞佩不已。至于肇祸之驾驶兵，依军纪固应受相当处分，但熊君之死非其一人之过错，故敝会谨代表全体同学恳祈贵军对肇事者之惩罚务请减轻为幸。[14]

此事见报后，工、学、商、法各界也纷纷投信市府、警备司令部及《解放日报》，恳切吁请为王国瑞减刑。警备司令部为此向华东军区陈毅司令、饶漱石政委和粟裕副司令请示。华东军区司令部为尊重民意，批准免处死刑，改判有期徒刑。6 月 15 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判处王国瑞有期徒刑三年，并发表公开信答谢各界人民的隆情厚意。[15]

在攻占上海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解放军扫雷 2 万余枚，收容遣散非法武装数千人，收容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 15427 人，成功地维持了社会秩序。随着上海日趋安定，8 月 1 日，警备部队换防，人数减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